

新历史小说 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

中国
当代

文学史资料丛书

程光炜 主编

白 亮 编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

程光炜 主编

白 亮 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 / 白亮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978-7-5500-2195-2

I. ①新… II. ①白… III. ①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714号

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

XIN LISHI XIAOSHUO YANJIU ZILIAO

白亮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杨 振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9.25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195-2
定 价	3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38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程光炜

—

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09）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期。后三十年中，又有“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等不同段落。本丛书的选编对象，是后三十年文学。然而，文学发展脉络除不同段落之外，还应有先后出现的流派、现象和社团将之串联成一个整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二十年代的文学就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沉钟社、未名社等大大小小的社团或流派，从这些现象中，既可观察这一段落文学的起伏跌宕、相互排斥与前后照应，也能对它们的纹理组织和贯穿线索有清楚的了解。

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沉淀不够，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还较短，它作为一个历史河床的激流险滩就来不及显露出来，供研究者做准确的测量、计算和评估。按照我做历史研究的习惯，凡是漂浮在文学批评和各种文坛传说中的文学现象，都不会列入研究目标，我会耐心地等它逐渐沉淀下来，待纹理组织和脉络线索都清楚显露出来之后，才把一个个作家作品这种单位摆放进去，设置一个位置。观察思潮，也应该强调它的历史稳定性，否则宁愿放着不做。但是我们知道，自所谓新时期文学开始运作之后，被文学批评推出的文学现象就层出不穷，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等，而且它们大都被已经出版的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用，在大学中文系文学史课堂上讲授了几十年。我没做过统计，关于它们的各种论

.....

1

.....

总
序

文不说上千万字，少说也有几百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研究论文详细讨论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①，或者对某现象的内涵外延加以界定^②，也分析到某现象在向另一现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③，如此等等。由此说明，当代文学史历史分期、段落传承、概念界定、现象、社团和流派等等的历史化研究，也并不像有些悲观者认为的那样犹如散兵游勇，布不成阵。^④

因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没有跟上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话剧、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第三代诗歌、文化散文、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到60后作家三十年来的文学史序列，除作家主动提倡、文学批评和杂志组织等推动因素外，是否还有社会思潮的刺激、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文学圈子的催发，还都没有被认真清理和反思。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沉钟社、新感觉派、乡土小说、京派、海派等社团和流派的文献史料，是经过几代学者数十年来默默无闻地爬梳、搜集、辑佚、整理和研究，才逐渐浮出历史表面，最后被确定下来，成为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的。而我知道，对当代文学史上这些重要现象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还只是处在启动的状态，更不用说以一所大学之力，几代学者之力，开辟为研究领域了。虽然如上所说，零星的“关系”“转型”“段落传承”等研究已有不错成果，但与现代文学史如此大规模、长时段和投入几代学者之力的宏大工作相比，远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事实，必须引起学界同人足够的重视。

二

本丛书的编撰是一项进一步充实当代文学史文献史料整理的工作。它分为《伤痕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改革文学研究资料》《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先锋小说研究资料》《新写实小说研究资料》《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朦胧诗研究资料》《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先锋话剧研究资料》《文化散文研究资料》《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茅盾文学奖研究资料》《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研究资料》和《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资料》，总计十六种，基本涵盖了当代文学史后三十年的重要现象。如果按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现代文学史社团、流派、现象的观点，可以将十六种资料略作

分类。第一类为文学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历史小说”“先锋话剧”“文化散文”“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外国文学译介”等；第二类为社团，如“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等；第三类为流派，例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等。所谓文学现象，是指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集中反映着当时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状况、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尤其是文学探索的精神。随着这些思潮的转移、跌落，这些现象也随之弱化和消失。所谓文学社团，按照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它一定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相对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关于这一点，“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都符合这些条件。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凡文学社团都有社团章程、组织、文学主张和固定的文学圈子，有固定的批评家和文学受众。例如“朦胧诗”，它源于1969年出现于河北白洋淀插队知青中的“白洋淀诗人”，主要成员有姜世伟（芒克）、栗世征（多多）、岳重（根子）、孙康（方含）、宋海泉、白青、潘青萍、陶锥涌、戎雪兰等，在北京工作或在外地插队的北岛、江河、严力、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也曾与这些诗人有交往。1978年12月，创办了诗歌小说和美术杂志《今天》，而以发表诗歌为主。杂志主编是北岛、芒克，成员有方含、江河、严力、食指、舒婷、顾城、杨炼等。由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代表了该杂志的章程、组织和文学主张，他们宣称：该杂志是要“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⑤《今天》这个文学社团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杂志延续至今的一个社团。虽然，它的主编、编委和成员几度变化，该杂志后来还转移到国外，但仍然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可以作为文学流派来研究的。首先，它们都曾有自己的“文学宣言”，固定的作者圈子，相对统一的创作风格，不仅影响了后来一代作家的创作，而且通过创作转型，当年的创始者后来也一直延续着当年的文学主张、审美意识和创作风格，例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寻根），余华、苏童（先锋）等。

鉴于上述社团、流派和现象的史料非常分散，缺乏系统整理，本丛书拟

以“资料专集”的形式出版。作为同类著作的第一套大型工具书，我们力图通过勾勒后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展现大量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意识到，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下一步更为细化、具体的史料整理工作开辟一条新路。如果从当代文学史文献收集、辑佚和整理工作的长远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社团史”“流派史”等，也应是不远的未来启动和开展。比如，“白洋淀诗人群”与《今天》杂志的沿革关系，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诗人回忆文章，但缺乏详细可靠的考证。又比如《今天》杂志编委会在八十年代的改组和分裂，也是各执一词，史料并不可靠。“寻根文学”的发起是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那次文学的“当代性”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由哪些人发起、组织，具体策划是什么，与会人员名单是如何选择、确定，没有翔实材料予以叙述，零星片断的叙述倒是不少，仍不能令人满足。另外，散会后，韩少功、阿城等是如何产生写作那些“宣言式”文章念头的，具体情形包括活动情况，研究者仍然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建立在考证基础上的“社团史”“流派史”史料丛书的陆续问世，仅凭简单材料写出的同类著作不仅价值不高，历史可信度也很低。这套书的工作，仅仅是为这一长期并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打下一点初步基础而已。

三

在编选体例上，我们在遵循过去文学史史料丛书规则的前提下，也对这次编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每本书的结构，分为主选论文和资料索引两个部分。主选论文是全文收录，资料索引只选篇目和文章出处。在资料索引部分，要求编选者尽量穷尽能够找到的资料，当然非正式出版的报刊不在此列。

二、视野尽量开阔，观点具有历史包容性，强调点与面的结合。主选论文，应以当时文学思潮、论争文章和后来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为编选对象；突出主要作家作品，一般作家作品可放在资料索引部分，作为对主选论文的陪衬，但也要求尽可能地丰富全面。

三、鉴于每本资料只有三十万字左右规模，这就要求编选者具有“选家”的眼光，用大海淘沙的耐心和精细触角，把对于历史来说，值得发掘和发现的

文献史料贡献给各位读者。

由于各位编选者都在大学工作，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尽管这套丛书筹备了好几年时间，还经过开会商讨和电子邮件的多次协商，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丛书，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它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

注释：

①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这篇论文运用详细材料，叙述了阿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棋王》后，被仲呈祥、王蒙等归入知青小说。1985年提倡“寻根文学”后，更多的批评家开始按照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认为它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阿城也有意无意根据采访要求，重新讲述这篇小說是如何寻根的故事。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知青小说”向“寻根文学”转换过程中的某种秘密。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作者力图在五十年至七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脉络中，分析“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在九十年代全球化大潮中逐渐衰老的深层背景。

③吴义勤的《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论及余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还有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赵园，一次就曾当面对笔者谈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菜市场”。这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秩序的看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分普遍，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表明许多学者在耐心阅读已有成果之前就下结论的草率。

⑤《致读者》，载《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文献史料贡献给各位读者。

由于各位编选者都在大学工作，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尽管这套丛书筹备了好几年时间，还经过开会商讨和电子邮件的多次协商，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丛书，仍有不少遗憾之处，它的疏漏也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

注释：

①杨晓帆：《知青小说如何“寻根”》，《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这篇论文运用详细材料，叙述了阿城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棋王》后，被仲呈祥、王蒙等归入知青小说。1985年提倡“寻根文学”后，更多的批评家开始按照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认为它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阿城也有意无意根据采访要求，重新讲述这篇小说是如何寻根的故事。这个案例，一定程度上说明，“知青小说”向“寻根文学”转换过程中的某种秘密。

②旷新年：《写在“伤痕文学”边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作者力图在五十年至七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关系脉络中，分析“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如何在九十年代全球化大潮中逐渐衰老的深层背景。

③吴义勤的《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论及余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还有很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赵园，一次就曾当面对笔者谈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菜市场”。这种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状况，始终没有自己的学科自觉和秩序的看法，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十分普遍，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史研究确实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表明许多学者在耐心阅读已有成果之前就下结论的草率。

⑤《致读者》，载《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目 录

1 新历史神话：民族价值观念的倾斜	1
——对几部新历史小说的别一解 / 李 星	
9 历史颓败的寓言	
——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 / 陈晓明	
29 新历史小说论 / 洪治纲	
38 与历史对话	
——新历史小说论 / 王 彪	
48 略谈“新历史小说” / 陈思和	
53 “历史”的误读	
——对于1988年以来一种文学现象的阐释 / 吴义勤	
62 历史话语的复活 / 蔡 翔	
76 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 / 吴 戈	

- 86 | 历史的眼睛在这里格外明亮
——新历史小说略论 / 欧阳明
- 94 | 把玩旧瓶的游戏
——“新历史小说”之我见 / 宋晓萍
- 97 | 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
——作为“新历史小说”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 / 张清华
- 107 | 故事与历史 / 南 帆
- 111 | “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 孙先科
- 116 | 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 / 舒 也
- 125 | 历史之钟的当代回声
——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 / 马相武
- 133 | “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 / 孙先科
- 147 |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辨 / 石 恢
- 154 | 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 / 王岳川
- 165 |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 / 张 进
- 177 | 走进历史隧洞的女性写作 / 刘思谦
- 186 | 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
——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 / 张清华

205 | 蜕变中的历史复现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 刘复生

219 | 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

——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 / 李阳春 伍施乐

230 | 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 陶东风

243 | 解构历史：新历史小说与穿越小说 / 陶春军

254 | 附录 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索引

新历史神话：民族价值观念的倾斜

——对几部新历史小说的别一解

李 星

进入本文视界的是几部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上展现民族苦难和民族凝聚力的中篇小说，他们是顾汶光的《江阴八十日》（《山花》1987年12期）、周梅森的《国殇》（《花城》1988年第12期）、邓友梅的《据点》（《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按照马克思关于原始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给这几部作品找到他们所依据的精神原型——这是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的历史神话的现代复活。然而最终使我们注意到的，却不是这几部作品中昂扬的古典精神和浪漫风格，而是它们在对民族精神的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中的一股清醒的战栗、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困惑。作者表现出对敌对民族、敌对政治营垒中不同人的理解，或是对向来受推崇的“气节”的绝对性的怀疑，或是由对理想人格的怀疑而进入对历史理想主义的否定，都具有一种或强或弱的民族价值传统的批判意识，民族历史的深刻的反省意识。与当前文学中某些先锋派作品相比较，这些作品对民族传统所持的态度无疑要温和得多，但是因为他们的批判不是那种先进观念的演绎，而是必然态势下的审美情感的倾斜，所以比那些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纯理性选择，更能见出民族价值标准的迁移轨迹。他们传达的已经不是风摆树梢动式的概念的偏移，而是如岩浆冲动地壳般的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如果将忠义、气节这些以往建构民族历史的柱石也拨到了文学的刀斫斧凿之下，就会导致对一部中国历史的重写。一向生活在安乐和自信中的中国人，将如远望在洪水中沉没的旧日的家园一般，并开始一种重寻精神家园的远征。是的，我们所提到的几篇作品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者们的伦理观

念或文学观念更趋向于对传统的认同，所以导致了作品的观念和情感的深刻矛盾，然而他们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正产生于这种不和谐之中。在人的审美实践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高度的稳定与和谐往往体现出主体生命力的静止和凝固；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情感的矛盾与不和谐，却往往昭示了主体生命力的深沉运动。从《据点》《江阴八十日》《国殇》对民族历史神话的复活趋向与否定趋向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如大震将至地声可闻的民族心理的大变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精英和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一直是建国后的中国新文学的主要题材，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种题材的文学也陷入了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僵死套式。在新时期中日友好的高潮中，这种题材又复活了一阵，但它在表现上的出新，又与这种题材的复活一样，出于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单纯动机，昔日的侵略者和杀人犯不仅具有了人性的面孔，而且在今天以赎罪的虔诚，诚心帮助中国人民的“四化”建设。邓友梅的《据点》既不同于这些作品，又不同于此后出现的奉行另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作品，它的创作动机既不是中日友好，又不是追究侵略战争的罪恶，所以更具有一种尊重历史的真诚。他的目的显然不单是谴责侵略者，而是通过对一个据点内外的历史生活氛围的重现，表现在一种非常条件下的民族生存状态和民族心理。这种在创作心理上对政治实用主义的摒弃，使邓友梅笔下的抗战生活呈现出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凡是有两个人以上的人类群落中就会存在的人情世态，任何人都会有有的类的归属要求和情感要求。这是人类的文化共性，在其现实性上又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即使在阶级和阶级，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尖锐对抗中，这种人类的文化共性也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从《据点》中看到的正是这种人性的弱点和优点，正是它决定了敌我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在这里人的品位的高低不只决定于他站在冲突的哪一方，也不全在于他的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在于他以何种方式与态度来处理一般的人际关系。我们大可怀疑《据点》的作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到他写的是一场人与人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人与兽的战争（这在比喻的意义上是可以用的），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教科书中的民族战争模式。但是《据点》中的民族尖锐对抗的历史究竟具有了互相交叉的另一面，不论是铁杆汉奸还是木杆汉奸都生活在由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所决定的人情世态中，而不只是生活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态度中，从而显露了一种新价值标准的端倪，这是由政治学向人类

学的过渡，由社会学向内在的人格情感的过渡。这里并不存在后者和前者的否定关系，它只是对一种单一的价位标准的补充。重大的民族外来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和历史哲学的建立，不仅会对发展民族文学有益，而且也会对克服狭隘的民族情绪，发展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合作与交往有益。它不仅不会导致民族的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尊心的消失，反倒会有助于一个强大的民族以强健的心灵平等地走向人的世界。

比起《据点》来，《江阴八十日》的结构更接近于我们观念中的民族历史神话原型，它的价值倾向更接近于传统。在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危难之秋，都有一些仁人志士在正史、野史或民间传说中被保留下来，作品中的明末义士阎应元、许用、女丐等是又一批民族英烈的形象，作者的写作更像史实的钩沉、还原、复制的工作。在今天的民族振兴中，召唤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民族之魂，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并且耳熟能详的思想逻辑。然而没有思维主体参与，完全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作者顾汶光也难逃这一规律的约束，我们从作品中既看到作家意识中潜在的解释结构对传统历史观的认同，又看到了今日时代的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不可避免地浸入，从而使作品溶进了作者新的历史感受和人的思考。它没有离开受命于民族危难之秋的义士——和可能出现的投降派的斗争——杀身成仁的模式，然而对人的理解、尊重乃至对死亡意义的敬畏，却拓展了作品的生命空间，扩大了它的历史阈值。阎应元在特殊情况下的选择的艰难，何尝不是作家伦理价值观的倾斜：“投降么，一死不足惜，于气节却有亏……，拒绝投降么，一己的气节是保住了，代价却是十万人的生命，难道一个人的气节重于十万人的生命么？”尽管“孔孟之书”“君国之恩”“史阁部英风余烈”最后占了上风，全城人因之成为英风厉鬼，但作品中这种一人之于十万、“气节”之于无辜生命的尖锐对立却难以令人忘怀。我们生活的地球虽然不断进步，但离世界大同之境尚为时很远，以至我们今天不得不把人类生存和民族利益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然存在着各民族利益的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民族交往中的气节、操守就是一种合理的道德规范。但是任何一种道德如果完善到一种绝对的境界，被奉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它就会成为窒息历史生命力量的绳索。“气节”在阎应元这样读孔孟之书、受君国之恩的士大夫身上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十万人的生命重要，但却比不上一个人的名节，于是十万人的生命，都成了神圣祭坛上的供品。当我们读到许用、阎应元、陈明遇

几家上至高堂老母下到弱儿幼女，都如羔羊般悲惨地死于一家之主的忠君（这个君曾经酷虐人民，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报国（这个大明国家也已土崩瓦解，多半已为满族人所建立的大清国所占领）的理想和信念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城破之时尸横遍野、流血漂杵的时候，我们或许在一刹那间产生出民族的自豪感、人类信仰精神的悲壮感，但很快地就会陷入长久的迷惘和怀疑，应该给气节这种士大夫发明的，而又更多为士大夫们所实践的道德信条怎样的位置？怀疑了它是否真的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委顿、民族凝聚力的消失？鲁迅曾经猛烈地抨击过吃人的旧礼教，这旧礼教、三纲五常难道不包括与神圣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气节”吗？如果一方面批判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却又把源于同一价值体系的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气节奉为立国之本，这不是价值倾向的自相矛盾，就是对旧的价值准则的顽固认可。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不正是中国社会精神的普遍特征吗？

浸入民族骨髓的中庸之道使我们对于死者、尊者特别宽容，它不允许我们如此苛刻、如此毫无良心地对道德的实践者指东道西，议论他们的血是新鲜的还是腐败的，是为公还是为私。《江阴八十日》的作者也并没有找到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他是在为民族英烈立传、歌功的情感推动下陪着主人公走完生命的里程。冷静的白描手法、充满文化意味的语言，这种艺术表现上的理性，不仅压不住，反倒更含蓄而深沉地倾泻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内在热情。为了突出人物选择了“名节”的道义基础，作者精心设计了女丐这样一个神秘的民意代表，这正是当代作家所惯用的证明自己笔下的历史不容置疑的合理性的方法，也等于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通行证。其实这种民意代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是大可怀疑的。然而借助他们的神力却可以把一个凡人变成英雄，把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高尚的人。尽管《江阴八十日》成功地复制了一部当代的历史神话，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它的矛盾、它的价值准则圆满中露出的裂痕。有了这个裂痕，我们也会失去判断的自信，我们不知道在“义士”的阎应元和沽名钓誉的阎应元中间何者更真实，更反映了作者的观念，我们只能指出：从作品以审美形式呈现的历史画卷中，人们究竟捕捉到了神圣下面的渺小、名节背后的狰狞，这是道德伦理同人性、人道主义冲突，是理智和情感冲突，是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趋向冲突的折光。

如果说《据点》和《江阴八十日》价值天平的倾斜更多来源于一般人性对

作者的呼唤的话，《国殇》中新的价值观的袒露，旧的道德理想的崩塌则更多来源于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建构。周梅森曾经在《沉沦的土地》《军歌》等作品中无情地撕毁了人的道德面具，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给了虚幻的人的尊严以越来越致命的打击，企图在更加坦率、真实的对人的考察上，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观念。生死存亡的人生大限，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将平日隐藏在意识底层的人的善与恶、怯懦与勇敢充分地暴露出来。就像将人剥了皮，现出下面的肌肉、血管、神经一样，历史在这里也露出了血淋淋的狰狞面孔：它不再是庄严华袞下的温情脉脉，也不再是由必然和规律支配的冰冷的客观，它是欲望和热情、理想和行为、恐惧和无畏、勇敢和怯懦的人的生命力量所偶然留下的时空印记。自然，任何个别和偶然可能最终都逃不脱普遍和必然的支配，但是周梅森笔下的历史究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具有了像人的生命和心灵那样丰富、那样不确定、那样变幻莫测的性质。“在史料的书面语言之下也隐藏着另一种语言，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但被忘掉的那种语言。在有意识的和有记载的历史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历史，这个历史没有被记载。”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周梅森所执着的正是对这个无意识的历史的还原。与史料和书面语言相比较，他更相信历史的本相存在于对最一般的人性、人的生命力的体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那种语言中。

在以诗学的形式还原或虚构与自己的历史哲学相适应的历史的时候，周梅森遇到了比邓友梅、顾汶光更深刻的矛盾：他要忠实于自己心中的历史就不能不冒着亵渎神圣的民族气节的风险。面对历史和价值、理智和感情的矛盾，周梅森并不比顾汶光与邓友梅更彻底、更勇敢。这里也有一个女丐式的虚幻的民意代表——小报的女记者，所不同的是，她没有女丐式地强加于人，而与她相对应的还有一群希望保全乡土和生命财产的“父老乡亲”，他们那种“仗是可以打的，但不要在陵城打”的呼声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然而众寡悬殊、援军无望的处境已使处于重围下的新二十二军军长杨梦征别无选择：要么投降，以一己之名节换二十二万生灵的生命；要么血战到底，以二十二万加一个军的生命给民族留下又一可歌可泣的精神的绝唱。“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历史又从军中师爷的口中道出，不过他不像女丐那样是对决策者的激励，而认为那是不可效法的前车之鉴：“大势去时，风扫残叶，大丈夫岂能为一人荣辱，而置一城生灵于不顾呢？”尽管小说中的叙事人不只是作家，作品中的人物也不